

# 面料出口持续增长 跨境电商潜力巨大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中国贸易报》记者近日从阿里巴巴获悉,阿里巴巴国际站发布的《面料行业跨境电商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纺织品出口发展趋势良好,出口额逐年上升。该报告显示,在2001年至2018年间,我国纺织业外贸迅速增长,增幅达到17.9%。2018年,我国面料出口达到210亿美元,约占世界纺织品出口额的1/4。面料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逐渐成为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国际站针对精选国内10个特色产业带上的具体行业发布相关系列报告,从贸易前端对买家画像进行分析,为卖家提供行业侧指导,《面料行业跨境电商发展报告》便是其中之一。

报告显示,前5个月,我国累计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483.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5%;其中面料出口占比接近70%,其余纱线、纺织辅料如羽绒、花边等填充物及装饰物占30%。

根据上述报告,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我国

纺织面料的主要出口地。而从国家趋势来看,越南是我国最大的面料出口市场,约占我国纺织品出口总量的9%、出口金额的10%。

阿里巴巴国际站家居行业高级运营专家沈晓燕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一直是纺织品出口大国,纺织品也是中国出口支柱产业之一。我国纺织品上下游产业链完善,从纺纱、织造、染色到成衣加工等都具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

沈晓燕说,近几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中国在纺织产业链中的成衣加工逐渐失去了价格优势,导致部分服装加工企业外迁。而东南亚的越南、印尼、柬埔寨,以及南亚的印度、孟加拉等成衣加工工厂,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生产成衣,出口欧美。虽然这些新兴国家的成衣加工业增长迅猛,但本国面料自给率严重不足,需要大量依赖进口。

根据报告,随着我国纺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面料进口继续减少。面料自主研发能力的不断

增强,使得一些过去由欧美日垄断的高端面料已能在国内实现自主生产,中国面料出口也呈由低端到高端的趋势,特别是功能性面料和印花类。目前,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印染布出口的主要市场。

对此,沈晓燕表示,中国面料生产不仅规模产量全球第一,产品质量水平也属世界顶尖,是东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面料进口首选国家。以孟加拉为例,其面料自足率仅为20%,其余全部从中国进口,特别是中国最强优势的涤纶、氨纶面料,每年从中国进口量达数十亿美元。孟加拉国也是仅次于美国,阿里巴巴国际站上中国面料企业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

面对面料出口的巨大商机,沈晓燕建议,中国企业要练好内功,保持危机意识,勇于开拓新兴市场,特别是从孟加拉、越南市场甚至非洲,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减少与传统欧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同时,要注重产品的研发与售后服务,通过升级与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根据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买家画

像和行为分析,面料将会越来越重视再生环保、功能性这两大主题。面料品种将会不断细分,特定场景下的面料种类将会越来越多,比如瑜伽裤面料、沙滩裤面料等,而不仅仅单纯停留在梭织、针织等传统意义上的种类。中国面料企业要不断开拓与创新,充分利用国际站平台,抓住面料出海的红利。

民生银行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员郭晓蓓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恰逢中国纺织业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期,为中国纺织业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共6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新兴市场。中国纺织企业应利用海外投资与并购,对全球各种优质资源如原料、设计、品牌、市场渠道等进行产业链垂直延伸,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附加值。另外,充分结合、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在纺织服装领域的互补性,实现共享、共赢。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面料产量为490亿米,全部集中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其中,浙江、江苏和福建位列全国面料产量前三甲,面料产量分别约占总产量的58.95%、12.66%和11.46%。而就商家数量集中度而言,阿里巴巴国际站上,面料商家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约占全部商家数量的87%,绍兴、苏州和嘉兴排名靠前;就竞争激烈程度而言,目前,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商家所在城市就其线下规模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跨境电商蓝海挖掘潜力依然很大。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跨境电商行业正在呈现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纺织服装类企业纷纷布局。然而,郭晓蓓也提醒,纺织服装企业进军跨境电商也不见得就一定都能够保证成功。毕竟跨境电商只是一种渠道,未来随着竞争的加剧,比拼的关键仍是产品,即满足客户追求的高性价比,或者细分领域的极致专业化,本地化服务竞争将成为未来跨境电商交易的关键点。

## 中国降低境外投资机构入华市场门槛

■ 本报记者 陈璐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以下合格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的重要表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卜永祖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国外来看,一是全球面临资产荒,美国债券利率倒挂,以及欧洲央行宣布开始重启QE(量化宽松),且再次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由-0.4%降至-0.5%。目前,国际上有投资价值的资金有限,因而,投资者倾向于购买风险较小的标的。此外,此前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欧美股市风险处于高位,西方国家开启降息息宽的政策,未来,利率还将进一步下调。对比国内来看,卜永祖称,中国上半年统计数据虽有所波动,但相比欧美等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仍表现较好,此前,加快供给侧改革,经济质量有所改善,新技术的发展较为迅速。

据了解,QFII制度自2002年开始,由证监会审核资格、外管局审核额度,前后经历了5次额度的扩容和两次监管的放松。在2005年、2007年、2012年、2013年和2019年外管局将其总额度分别提升至100亿美元、300亿美元、800亿美元、1500亿美元、3000亿美元。而国家外汇管理局本次取消限额,无疑是最大的改革。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也将逐步出炉,且不再对单个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进行备案和审批。

“实际上,外资机构,尤其是金融养老保险机构等需要找到安全的、具有好的前景与预期的投资目的地,因而,很多境外大型投资机构看好中国市场。”卜永祖认为,境外风险容易传导,金融领域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我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决心与态度,也是金融行业的实力与监管水平提高的表现。

卜永祖称,“从短期影响来看,这一举措给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信心。长期来看降低了门槛,便利外资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当然,加快金融开放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关键。”卜永祖建议,一是国家要加快股市存量改革、推进不良公司退市进程,提高对操纵股市的打击力度、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二是要加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加快深港通、沪港通、沪伦通实现国内资本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双向互动。三是要加强和完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也可以与国际资本市场经营服务商开展合作。



## 全客户全产品全渠道 科技助零售金融驶上高速路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近年来,在资本约束、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等因素的影响下,零售业务正在逐渐成为我国银行业创收的重要引擎。同时,金融科技概念日益兴起,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在产品、服务、流程、风控等各领域进行系统性改造,金融科技该如何更好与零售业结合?

“目前的银行零售业务或零售金融和10年前有较大的不同。”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主任李健近日在2019零售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表示,10年前的零售业务是对个人、对企业的业务,现在的零售金融被称为大零售,涵义更加广泛。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除了原有的零售板块以外,现在大零售板块当中也包括银行、消费金融等机构对小微、三农企业、农户,以及中小制造企业的服务。

同盾科技副总裁顾威表示,零售金融服务将实现客户、渠道和产

品的全面延展。一是服务全客户,金融机构将全面、深入、立体地认知客户、延展边界、泛化内涵,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赋予全新内涵。二是整合全产品,零售金融产品的内涵将进一步扩大,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综合解决方案。三是拓展全渠道,从线下到线上,从物理网点到远程、外拓,从自身到合作,客户与金融机构的每一个触点和连接都是渠道的延展。

“科技赋能零售金融将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表示,大零售时代是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还要更好地拥抱金融科技。江苏银行总行运营部总经理沈志峰介绍说,从2016年开始,银行进入了4.0状态,即全渠道银行经营的模式,伴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的发展,银行在数字化中做

了不少探索和尝试。李健称,几乎所有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或提出数字化转型顶层战略,或提出金融科技赋能的概念。

在银行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后,沈志峰预判,零售银行盈利预计将会增长30%,其中有8%至9%都是来自运营效率的提升。“数字化运营转型当中,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只是简单零售业务的占比、收入的提高,而是从技术底层到客户体验的一个系统工程。”沈志峰解释道,数字化转型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递进关系:一是底层架构系统的转型。二是重塑业务流程,建立数字化运营。三是搭建用户运营和场景生态。同时,重塑客户旅程和渠道重塑也是数字化运营的重要环节。

对中小银行而言,零售业务数字化转型仍然任重道远,还存在人才短缺、合作机制不畅等多方面的挑战。对此,沈志峰表示,零售银行

数字化途径有四个方面,一是集约化、场景化的批量获客模式,实现规模化增长。二是数字化和金融科技创造全新的客户体验。三是通过具有智能化、精细化的大数据技术给新客户带来新的风险控制和深度经营能力。四是伴随着新的账户体系,二三类账户可以助力摆脱网点的限制,推动整个数字化全渠道运营的战略。

“做零售金融必须要考虑如何充分发掘数据价值,面向客户开发出更多基于新数据的分析模式和服务模式,以适应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实现无处不在的交互。”杨涛表示,无论是零售金融的构建,还是所谓的开放银行,种种银行数字化转型都离不开支付设计和清算安排。特别是零售支付,这些工具对应的金融账户体系已经受到冲击和影响,依附于支付端衍生出来的商业模式生态也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对象。

# 企业走出去,劳动用工合规了吗?

■ 本报记者 钱颖

劳动用工合规始终贯穿境内企业走出去全过程的各个方面,所以企业境外经营合规中,劳动用工合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重视并加强跨境用工合规的学习,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各国特殊要求进行用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雅暄表示,我国企业只有明确知晓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才能更好地核算投资及用工成本、做好战略规划,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进行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使得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稳更远。

在企业走出去劳动用工合规风险中,工时休假管理风险和解雇员工风险最为常见。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工时休假是造成劳动争议的重要风险点。”黄雅暄表示,很多国家、地区对工时和加班时长有严格的规定,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要求雇主不得在下班时

间联系雇员。2005年12月,沃尔玛因剥夺员工中午午休时间,且未给员工薪资补偿,被加州法院判处向包括离职员工在内的员工支付5700万美元损害赔偿金和1.15亿美元惩罚性赔偿金。我国广争争议中已成现象的“996”或“007”工作制,一旦在国外使用,可能面临劳动部门的监察、整改甚至是严厉处罚。与此同时,外国工会组织的力量也会在企业实施不当加班制度时强势体现出来。工会可能通过协商或组织员工罢工、示威来迫使企业遵守法定工时制度,建立合理的加班政策。

据了解,在休息休假方面,各国年休假长度的规定不同。有些国家对员工享受年休假有服务年限的要求,比如法国要求工作满12个月后的员工可享受35天带薪年假,而我国要求员工工作满2个月后可享受5天带薪年假。有些国家员工

入职当年即可享受带薪年假,如澳大利亚雇员自入职享有法定4周带薪年假。此外,对于年休假是否可以累计,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同。企业在制定员工手册或劳动合同时需要注意当地关于年假累计或折现的具体要求。比如韩国劳动标准法并不强制累计未使用年假,雇员年假一般需要当年用尽或雇主在员工明确表示同意折现的情况下折抵对应工资支付给雇员,通常雇主必须承担通知义务,及时告知员工的剩余休假天数,协助员工妥善制定休假安排。

除了休假管理风险外,解雇也是企业员工管理的重要难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企业解雇都会带来一定风险。“不同国家对企业单方解雇的限制、程序要求不同,企业违法解雇的责任也有大小之分。纵观各国解雇模式,主要有三类,包括自由解雇、合理解雇与法定解雇。自由

解雇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即为美国。美国大部分州实行自由解雇,即不需要理由、补偿金、通知期就可以解雇员工。合理解雇,属于相对自由的解雇模式,需要雇主提供解雇理由,英联邦国家实施这一模式。法定解雇,即解雇必须符合法定条件、法定程序、法定补偿,以中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为例。”黄雅暄表示。

另外,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中关于特定员工的解雇保护规定,这些员工通常包括:特定女职工、特殊员工如残疾、疾病员工、在家庭中负有抚养、扶养义务的员工,加入工会或参加工会活动的员工等。各国禁止解雇的情形有极大的相似性,一般会在法律中进行明文规定。黄雅暄称,若解雇该类员工,极可能构成违法解雇,违法解雇后雇主的责任一般是对员工进行复职或者提供补偿金,有些国家也对违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日前发布的《201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降至2.3%,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已经陷入衰退,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此外,随着全球需求疲软,加上美国政府的单边关税行动,今年的贸易增长将严重减缓,去年贸易增长率降至2.8%,今年可能低至2%。

报告指出,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担忧不断加剧,但增长减速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艰难,尤其是南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西亚。甚至在贸易摩擦升级之前,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增长率就已经下滑,原因是央行紧缩银根后资本流入下降,一些地区已经变成负值,此外,初级商品价格下滑也是一个原因。

“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迫使它们通常以短期美元计价债券的形式积累外汇储备,以防止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和遏制其不利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向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地区,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困境。要想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融资更加可持续,需要紧急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使发展中国家摆脱目前的债务陷阱,为更好地调动国内资源提供支持,并在实现发展型增长的同时促进环境保护。

跨国公司出于税收动机的非法资金流动,估计每年剥夺发展中国家500亿至2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类流动受到国际公司税收准则的推动,这些准则将跨国公司视为独立实体,将跨国公司不同实体之间的应税交易视为互不相关。为解决上述问题,报告建议采用统一税制,承认跨国公司的利润是在集团以及集体产生,单一税制应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实际公司税率相结合,设定在20%至25%左右。

报告认为,经济活动的迅速数字化正在改变价值创造、计量和分配方式,给国际税收框架带来新的挑战。为缓解上述问题,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国际税收规则和规则,以确定税收划分,如何处理跨国公司不同实体之间的跨境交易,以及在无形资产和数据用户成为重要价值来源时,如何衡量价值创造等。这导致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和20国集团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在谈判中推进,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探讨了关于数字经济的临时单边国内税收措施,采用消费税、平衡税或其他方式,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尚未达成共识。

联合国贸发会议：今年贸易增长率将降至2%